

《国际反恐合作的考验》

国际社会联手抗拒并打击恐怖主义的崛起和横行，乃出自守护现有的普世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的需要。国际反恐合作必须要超越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和宗教、族裔的认同，只因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公敌。

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向跨国的恐怖主义打响了第一枪，掀起了反恐的序幕。随着以发动伊斯兰教圣战为名的激进组织，迅速在全球各地拓展其组织人脉、扩张其影响力，有关国家基于各自国安的考量，纷纷加入打恐的行列是理所当然的。

由于各国的国情迥异、维稳条件不一，故此不同国家要有效打恐，手法与战略布局不尽相同，也是情理中事。因此，国际的反恐、打恐合作要事半功倍，就离不开求同存异。任何仗着国际话语权，以自身地缘政治利益来设定反恐标准，动辄对他国的“反恐”努力无限上纲指指点点的行为，只会削弱国际间的反恐合作，变相助长恐怖势力的滋长。

就以目前陷入新冷战的中、美两大强国来说，不论是针对“基地组织”[Al - Qaeda]、ISIS 伊斯兰哈里发国或是东突厥斯坦的斗争，其本质都可定性为“反恐”、“打恐”。不同的是，美国的打恐战场是在境外；而中国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，以自己的资源和方式，阻遏着分裂势力恐怖暴行的蔓延。

理智告诉我们：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根本不应该扼杀反恐战线上的合作；更不应该用作反制对手的政治筹码。近20年来，美国出兵阿富汗，以“反恐”之名要歼灭80年代它一手扶植的塔利班，但徒劳无功，以致泥足深陷。可近年来，美国朝野却把中方在新疆的反恐手段，刻意贴上压制维吾尔族的标签，并扣上违反人权的帽子，用意至为明显，不外是要在国际间进一步孤立中国，并为其发动的“新冷战”增添多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这种行径跟美国一方面声援和赞扬香港的街头黑暴；可另一方面则对自己本土的反种族歧视抗争极尽镇压之能事，同出一辙，都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。这在在暴露出美国在领导全球反恐斗争中，对界定恐怖主义定义的飘忽——没有一贯的标准，只有因事而异、因时而异、因地而异的美国环球战略的利益考量。

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，华盛顿当局热衷于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，以世界霸主的身份自居，主导全球的反恐。这为它开了方便之门，动辄以反恐为名，长驱直入他国，颠覆并推翻当地政权

。及至特朗普上台后，尽管白宫口口声声强调“本国优先”，却丝毫不改其干预的本性。令人永远纳闷的是，迢迢万里美国境外的他国内政，曾几何时也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安威胁。

有鉴于此，国际反恐的合作要更能彰显其绩效，联合国就必须责无旁贷行使其主导的角色。与此同时，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也应该提升到同其它应付“天灾人祸”的国际合作同一等次。其实，不论是气候变化、核武威胁、流行瘟疫、粮荒水荒或恐怖主义等，都足以威胁人类的存亡。

与此同时，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恐暴组织的定性识别，国际合作机制不能没有划一的标准，否则执掌国际话语权的霸权强国，势必会以“反恐”之名行“霸凌”之实。这对弱小国家的主权，无疑是莫大的威胁。

在这方面，应付国际恐怖主义的跨国合作机制，不能老是以资源匮乏作为“和稀泥”的方便借口。相反的，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，经历了接近30年的磨合和考验，不能还是停滞在经贸互通的层面。反恐层面的跨国合作，不单考验着多边主义的多维度磨合，同时也测试着现有国际秩序下全球治理模式的成败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没有坚实的共同信念和政治意愿支撑的国际反恐合作，对现有的经济全球一体化，恐怕起不了保驾护航的作用。

因此，任何只着眼于短线操作的本土民粹政治，在多党制的国家，纵使在选举角逐中会有所斩获，甚至赢取政权，但在国际恐怖主义席卷全球的阴影下，甚难独善其身、置身事外。毕竟，未来的全球治理会走向何方，盛衰荣枯，将完全胥视国际合作机制的成败，尤其是在反恐的战线上。这考验着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治理智慧，无一例外。 [完]

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

翁诗杰（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原副议长）

2020-9-28 @ 吉隆坡

[注：第三届中国-东盟地区安全与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主旨演讲全文。

主办方：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

日期：2020-9-28]